

西北大学

硕士学位论文

近代陕南庙会经济初探

姓名：彭宁

申请学位级别：硕士

专业：中国近现代史

指导教师：李刚

20090608

近代陕南庙会经济初探

摘要：本文以近代陕南庙会经济为研究对象，其目的在于通过对近代陕南地区庙会经济活动的分析，总结历史经验，为今日陕南的经济的发展服务。本文以客观史实为依据，对近代陕南庙会经济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进行探析。并运用历史学、经济学、统计学等多学科的方法，系统的判断陕南庙会经济的发展程度和历史作用。

陕南庙会在明清时期的繁盛，促进了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到近代鸦片战争后，陕南庙会经济逐渐发展缓慢。庙会商品结构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洋货代替国货进入百姓生活，引起社会消费观念也发生了变化。虽然清末民国年间陕南庙会的起落影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但在陕南区域经济中，庙会依然是一个调剂余缺的基础性市场，对沟通城乡物资交流和实行农业资源配置发挥着愈来愈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近代 陕南 庙会经济

近代陝南の寺祭の経済を初めて探す

要約: 本文は近代の陝南の寺祭の経済を研究対象にして、その目的は近代の陝南地区の寺祭の経済活動に対する分析を通すことにある。歴史的な経験を総括して、今日の陝南の経済の発展のサービスのため。本文は客観的な史実を根拠にして、近代の陝南の寺の縁日の経済に対して、マクロとミクロの二つの方面から探索を行います。そして歴史学、経済学、統計学のなど多重学科の方法を運用して、陝南の寺祭の経済の発展の程度と歴史の作用に系統的な判断だ。

明清の時期に陝南の寺祭は繁栄した、この地区の社会の経済の発展を促進した。近代までアヘン戦争の後で、陝南の寺祭の経済が次第に発展するのが緩めた。寺祭の商品構造もとても大きい変化があつて、外国製品は国産品に代わつて、庶民の生活に入つて、社会の消費の観念にも変化が発生したように引き起こした。清末民国年間に陝南の寺祭の変化は社会の経済の発展に影響したが、しかし、陝南地区の経済の中で、寺祭は依然として調剤の過不足の基礎性市場で、都市と農村の物資をつなぐことに対して、農業の資源の配置を交流して、ますます重要な作用を発揮していた。

キーワード: 近代 陝南 寺祭の経済

西北大学学位论文知识产权声明书

本人完全了解西北大学关于收集、保存、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学校有权保留并向国家有关部门或机构送交论文的复印件和电子版。本人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本人授权西北大学可以将本学位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编入有关数据库进行检索，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扫描等复制手段保存和汇编本学位论文。同时授权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等机构将本学位论文收录到《中国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或其它相关数据库。

保密论文待解密后适用本声明。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彭宇 指导教师签名：彭宇
2009 年 6 月 8 日 2009 年 6 月 8 日

西北大学学位论文独创性声明

本人声明：所呈交的学位论文是本人在导师指导下进行的研究工作及取得的研究成果。据我所知，除了文中特别加以标注和致谢的地方外，本论文不包含其他人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研究成果，也不包含为获得西北大学或其它教育机构的学位或证书而使用过的材料。与我一同工作的同志对本研究所做的任何贡献均已在论文中作了明确的说明并表示谢意。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彭宇
2009 年 6 月 8 日

近代陕南庙会经济初探

引言

庙会，是中国传统民间社会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与传统社会中尤其是农民的经济文化生活和日常生活密不可分。近年来庙会成为国内历史学界和民俗学界研究的热点课题。借庙会之名，行商贸之事是明清以来至现代陕西商品经济发展的突出景观。这种经济形式把民俗文化活动与商品交易结合起来，文艺搭台，经济唱戏，使庙会在沟通城乡物资交流，实行农业资源配置方面发挥愈来愈重要的作用。

i. 相关学术文献回顾

就全国范围而言，庙会研究一直是学术界的热点话题，众多学者从不同侧面进行了探讨。近年来，涌现了一批卓有成就的庙会研究专家及其学术专著。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高占祥《论庙会文化》（文化艺术出版社 1992 年）；赵世瑜《狂欢与日常——明清以来的庙会与民间社会》（三联书店 2002 年），王兆祥，刘文智《中国古代的庙会》（商务印书馆 1997 年），朱小田《近代江南庙会与农家经济生活》（载《中国农史》2002 年第 2 期）。参考类的著作有张双林《中国庙会大观》（工商出版社 1995 年）。

但是关于陕西商品经济和庙会研究的著作，目前全国还比较少，只有田培栋《陕西社会经济史》（三秦出版社，2007 年版），李刚《明清时期陕西商品经济与市场网络》（陕西人民出版社，2006 年），王一成《陕西古近代对外经济贸易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等著述对陕南集市和庙会有一定论述。

此外还有部分学者的相关论文，如李刚、郑中伟《明清陕西庙会经济初探》（《西北大学学报》2001 年第 2 期），张萍《明清陕西庙会市场研究》（《中国史研究》2004 年第 3 期），丁德科《从陕西榆林看庙会引发的问题与对策》（西安财经学院学报 2007 年 20 卷 1 期），徐礼山《清代汉江上游的商品流通与市场体系》（西北大学 2004 年硕士论文）等对陕西庙会经济有所探讨。

虽然上述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目前有关陕西庙会的著作只是对整个陕西或关中地区商品经济和庙会经济进行研究，而对陕南地区庙会的研究涉及很少，目前尚没有成熟的专门性著作。在此情况在，必须搜集大量的陕南地方志史

料,或进行实地考察,通过整合历史学、经济学、统计学等多学科的方法,做出系统的科学的判断,才能得出新的研究结论。本文仅在此基础上,对这一课题做尝试性的研究。

陕南地区由于其特定的地理位置,地处秦巴山区,北接关中,南连四川,东通武汉,中有汉江横贯,气候温暖,雨量充沛,土地肥沃,人称“小江南”,属于巴蜀经济文化的一部分。陕南庙会历史悠久,如汉中勉县武侯墓清明庙会,自公元 263 年刘禅下诏立祠,至今已有一千七百多年,每年的清明前后都会举行庙会,经久不衰,对汉中及其周边地区影响深远,成为陕南地区规模最大的庙会。陕南地区几乎在汉中、兴安、商州各府,所属各州、县、村、寨均有庙会,家家酬神,户户报赛,由于交换发达,文化发展,庙会成为社区行为,往往各村轮流办会,使庙会成为村村有会,月月有会的经常性交易行为。在这些古庙会上,买卖集中,购销畅旺,商人趋时偕来,棚帐互支,扰攘经旬,上市骡马以千计,羊上万头,京货、估衣、竹器、农具,牲畜巨陈,云集交易,且外省商贩纷至沓来,这种有支付能力的集中消费,为商品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市场和广阔的余地。陕南庙会在明清时期的迅速发展,促进了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到清末鸦片战争后,陕南庙会经济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发展缓慢,逐渐走向衰败。庙会商品结构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洋货进入百姓生活。由于近代社会变迁的制约,陕南庙会市场表现出滞后的特点,限制了商品经济在当地的深化。虽然清末民初陕南庙会的起落影响了经济的发展,但可以看出在陕南区域经济中,庙会依然是一个调剂余缺的基础性市场,甚至是地域内集散市场乃至区域市场的依托。陕南庙会对沟通城乡物资交流,对农业资源配置发挥愈来愈重要的作用。充分利用这一传统交易方式活跃城乡市场,对推动陕南区域商品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因而深入研究庙会的发展,是认识陕南乃至整个陕西商品经济和社会变迁的一个契机。通过对近代陕南地区的庙会经济活动的研究,有助于我们了解当时陕南商品经济的发展状况,以及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为当今陕南的经济建设更好地服务。

2. 概念界定

在本文的研究中,“近代”、“陕南”、“庙会”、“庙会经济”是关系全文论述的关键词,需对其进行界定。

首先,本文所讨论的近代,是指从鸦片战争至 1949 年。为了论述的必要,

亦适当追溯到明朝到鸦片战争前的这段时期。其依据在于，庙会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具有历史的延续性。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明清时期为庙会经济的繁荣发展时期，而鸦片战争后，庙会的发展又出现了近代的特征，它既是前代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又是后世社会经济演化的历史基础。

再次，**陕南**。陕南，习惯指秦岭以南的陕西管辖区（包括今天的汉中、安康、商洛三个地区），北与关中以秦岭为界，南临四川、湖北；东与河南相邻，西与甘肃连接。北有巍峨的秦岭山脉雄峙，南有巴山山脉，汉江由西而东横贯其间，嘉陵江在西部由北而南流去，丹江、洛水于秦岭中部褶皱岭中滚滚向东。在江河所流过的谷道中，形成了众多的盆地，较大的有汉中盆地、西乡盆地、安康盆地、商丹盆地和洛南盆地等。陕南地区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气候温暖，雨量充沛，土地肥沃，人称“小江南”。

第三，庙会和庙会经济。长期以来学术界存在多种对“庙会”概念的解释。顾颉刚认为庙会为“香会”^[1]。全汉升认为“‘庙会’就是庙市的意思，二者并没有分别的地方。”^[2]《中国风俗辞典》解释为：“庙会，亦称庙市。在寺庙或寺庙附近的定期集市。”^[3]学者小田认为“庙会是以庙宇为依托，在特定日期举行的，祭祀神灵、交易货物、娱乐身心的集会。”^[4]我认为：“庙会”是一种依托宗教庆典祭酬节日、在佛寺道观及其附近形成的集游艺、商贸、宗教于一体的大型民间集会。“庙会经济”是指“以庙会的形式而开展的商业行为以及相关的经济活动。”

[1] 顾颉刚：《妙峰山》，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8月影印本，第13页。

[2] 全汉升：《中国庙市之史的考察》，《食货》第一卷第二期，1934年12月16日。

[3] 《中国风俗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0年1月第529页。

[4] 《史学月刊》，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期。

第一章 陕南传统庙会的概况

1. 明清陕南庙会经济发展的原因

1.1 人口迁徙

陕南地区北与关中以秦岭为界，南临四川、湖北，东与河南相邻，西与甘肃连接。北有巍峨的秦岭山脉雄峙，南有巴山山脉，汉江由西而东横贯其间，嘉陵江在西部由北而南流去，丹江、洛水于秦岭中部褚岭中滚滚向东。在江河所流过的谷道中，形成了众多的盆地，较大的有汉中盆地、西乡盆地、安康盆地、商丹盆地和洛南盆地等。陕南地区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气候温暖，雨量充沛，土地肥沃，人称“小江南”。自古为战略要塞，但社会经济发展一直比较缓慢，直到明末因战乱流民的大量涌入，才得到较大的开发。

明时，陕南地区为封禁区，地广人稀。明末大规模农民战争更使其深受创伤：人口凋零、土地荒芜、经济残破，“荒榛茂草遍城下，虎狼夜食鸡犬，居民不能息也”。^[1]“汉、沔间几无宁日”。^[2]连年战争还带来可怕的瘟疫和灾害，大批居民死于饥荒、瘟疫，致使清初出现了“国初定赋，人户荒凉，原定之额不能符数，土著百姓以纳课为难”。^[3]战争结束后，清政府为稳定政权，确保财政收入，对陕南等地采取了招徕流民、开垦荒地的措施，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清乾隆以后，外省移民大量迁往陕南，促使该地区人口骤增数倍。因为该地区有着自然资源丰富、地理位置适中、地广人稀、税率偏低、地租轻微等优越的自然和社会条件，对于移民有着很大的吸引力，以致成为“流民渊藪”，聚集了大量流民。嘉庆《汉南续修府志》卷二十一《附志山内风土》记载了汉中府各县移民的情况：国初，若新民则数十年内侨寓成家，南、襄、城、洋、沔平坝之中，老民尚多，南北两山及西、凤、宁、略、定之属，则老民十只二三，余均新民矣。新民两湖最多，川民亦多，次湖籍，安徽两广次之，则河南、贵州间亦有之。

明清之际，因“迁海”、“圈地”及战乱灾荒等，南方各省大量贫民流离失所，安康地区兵燹天灾之后，人口锐减，田园荒芜，白业凋敝。朝廷动员南方各

^[1] 钱鹤年：《汉阴厅志》，清道光二十三年刻本，卷九。

^[2] 钱鹤年：《汉阴厅志》，清道光二十三年刻本，卷九。

^[3] 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清道光二年刻本，卷十二。

省灾民移垦陕南，大批移民扶老携幼，络绎不绝的进入安康，带来了大批的劳动力及南方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经过几代人的艰苦创业，人口迅速增加，玉米、红薯等适宜于中高山旱地种植的粮食作物及棉花、烟草等经济作物得到了引进和推广，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的程度不断加深，垦殖范围从川道河谷渐次向中高山拓展，到清嘉庆(1796~1820)年间已达“寸土可耕，尺土可灌”的程度。空前规模的山区经济开发，提高了传统农业的生产力水平，带动了手工业、商业、运输业的兴起，在社会相对安定的时期，铜铁冶炼、竹木造纸、丝棉纺织、煤金开采、森林采伐、土特产品加工以及制陶等工厂、作坊星罗棋布，安康城镇商贾云集，茶叶、生漆、桐油、木耳等土特产品远销西北及南方各省，鼎盛时期，山间要道马帮如绎，江汉“舳舻上下，帆樯林立”。汉水及其支流沿岸以商业、服务业为主的集市应运而兴，成为区域性商品集散地。白河、紫阳、宁陕、镇坪、岚皋等位于深山边远的地区相继设县，奠定了安康地区城镇集市分布的基本格局。

从历史上看，陕南地区由于交通不便，在农业技术上很少与周围地区交流，所以农业生产水平远在宋代就比周围地区落后，直到明初还没有根本性的变化，周围山区仍实行“刀耕火种”。而随着人口的剧增，使封闭的秦巴山区得到了空前的开发。大量涌入的流民带来了先进的农业耕作技术和灌溉技术，农业生产也发展了。一是新作物的引进和推广。如玉米、马铃薯在山区的推广，增加了这里的粮食总产量，也改变了粮食结构。二是粮食单产的提高。流民带来的先进的灌溉技术使得山区能够引水种田；流民还改了进耕作技术，提高复种指数，大力推广一年两熟制，这样产量提高了两倍之多，使昔日不毛之地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由于移民的大量迁入，移民与市场关系更加密切，山区内部市场渐趋活跃。即使在一些偏僻的山区，由于流民的积极活动，商品经济也变得异常活跃起来。城固“至道光、咸丰间，农多饱暖，商裕财货，县境世家望族，闾里之民户口滋繁，称极盛焉”。^[1]安康在嘉庆年间，粮食除自给外，还可贩粮至别处，“皆有囤户积粟以待策贩……郡城富商大贾所营之谋，岁下襄阳，其利数倍”。^[2]这说明一些地区粮食不仅自给有余，而且还部分走上商品化道路。

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社会里，粮食种植与家庭副业牢固结合。缺乏分工意识的农民只有在种植的粮食满足自身需求之外，才有余力从事家庭副业生产，以

^[1] 《城固乡土志》民国二十六年铅印本，卷一。

^[2] 王森文：《安康县志》，清嘉庆二十年刻本，卷十。

补贴家用。随着耕地面积的扩大和高产作物的引种使粮食产量得到很大的提高，这为农民从事经济作物的种植和手工业的生产打下了重要的物质基础；同时，大量涌入的流民和随之带来的先进农业耕作技术和手工业技术又为从事商品生产提供了充裕的劳动力和技术支持。因此导致在清中期以后，陕南出现了商品生产蓬勃发展的局面。

经济作物有棉花、油菜、烟草、蚕桑、麻、茶叶、药材、蔬菜及瓜类。经济林有桑树、果树、油桐、漆树、栎树等。它们对农民的生活具有重要影响，几乎供应着人们衣食住行各方面的需要。而且，它们多系农家种植或采摘，对于农村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它们作为商品出售或转化为商品生产，成为农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商品经济的发展为陕南庙会经济的繁荣奠定了物质基础。

1.2 交通

交通便利与否对商品经济活动有着巨大的影响。明清时期，虽然陕南地区物产丰富，品类众多，销路亦广，但因交通不便，大大妨碍了正常的商业交往。陕南水运以汉江最为重要。

汉江是陕南地区尤其是汉中安康地区与汉江经济区联系的“黄金通道”。汉江是长江的最大支流。它源于宁强五丁关、陈家大梁一带，穿行于秦岭、巴山之间。由西向东横贯陕南全境 780 公里，经白河县进入湖北，汇入长江。流域面积 41439 平方公里。多年平均径流量 20 亿立方米，年径流深 4851 毫米。但由于明末农民战争，汉江水运遭到极大的破坏，在清初也未得到恢复，汉江的大规模商品流通自是难以发展。乾隆以后随着大批流民的持续涌入，人口大幅增加，商品经济日趋活跃，汉江水运也渐趋繁盛。清至民国，山货土特产品输出，日杂百货输入，主要靠水运集散。当然运输价格的比较优势也是推动汉江水运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清代汉江水运的价格与陆运相比要低很多，与之相比陆运价格要高出许多，以粮食为例，水运为每公里每石 0.0013 两，而陆运则为每公里每石 0.0065 两，是水运的 5 倍。因此采用水运商品是情理之中的事。

汉江干流水运发展迅速，一是由于流域内农业商品化程度的提高和手工业的迅速兴起，有商品货物可以进行贸易。二是由于货物进入汉江，便可顺流直下，无靠岸换装之繁难，减少了运输的成本。乾隆以后，陕南的大部分商品，都经汉江运往湖北。而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手工业品，也沿汉江溯流而上，运至安康等地，再转销陕南各县以及川北、陇东。

陆路方面，汉中与关中当中横亘秦岭，“由华州经蓝田至宝鸡，共七十二峪口”，都可通汉中地区，但较大的通道有六条：①北栈道。由褒城经大散关出益门镇至宝鸡，山程六百里。②古褒斜道。经太白山达眉县。③古傿骆道。由华阳经佛坪通周至。④子午道。由午口入谷，经宁陕出子口达长安。⑤由安康经镇安、柞水出秦岭。⑥由商县、蓝田至西安，为通湖北之要道。在以上诸道中最主要的是北栈道，这不但是关中通往汉中的大道，也是古代陕西通往四川的大路。虽是大道，山峻水急，使行人抱有戒心，至于运输货物，只能是肩挑人背。

民国二十一年陕南陆运脚力调查表

起止地点	运输方法	货物重量 (斤)	运输费(元)	需要天数	附注
西安至汉中	挑夫	100	14	12	走子午道
西安至安康	背夫	100	11	10	背运生漆， 脚力稍贵
柞水至西安	背夫	100	5	4	
石泉至西安	背夫	100	12	12	走子午道
西乡至西安	背夫	100	12	12	走子午道
双石铺至西安	牲驮	220	6	3或4天	
凤翔至汉中	骡驮	280	16	12	走北栈道
潼关至商县	挑夫	100	4	4天半	
潼关至商县	挑夫	240	5	4	
潼关至商县	骡驮	100	5	4	
西安全龙驹寨	挑夫				-

(资料来源：田培栋：《陕西社会经济史》，三秦出版社，2007年版，第610页。)

其次，陆路由汉中通往四川的道路，大约有四途：①古金牛道，亦名南栈道，经沔县、宁羌入四川。②古米仓道，经黄官岭、米仓山通南江。③经牟家坝、回军坝入西河口分岔，一入南江，一入通江。④经西乡、镇巴至万源。以上四道以金牛道较为平坦，其余均崎岖难行，惟背负而已。

再次，陆路由汉中通甘肃有两条道路：①由北栈道双石铺至两当。②由略阳至徽县、成县。

以上为明清时期陕南陆路交通的大概情况，根本无车辆运输，最好的运输工具就是骡马的驮运。因交通工具的限制，大宗的货物是无法运输的。即使到了民

国初年,运输情况也没有根本改变,仍以人挑、人背、牲驮为主。

2. 明清陕南庙会的特点及其作用

2.1 明清陕南庙会的数量及其概况

以汉中府为例,汉中境内的观、宫、祠、庙,各朝历代屡有建修,其杂祀之庙,遍及城乡。据明清以来的《汉中府志》及各州、县、厅志记载,汉中府城及各州、厅、县城均设有祀奉各种神仙的祠、庙、宫、坛等,如文昌祠(庙)、关帝庙、城隍庙、禹王庙(宫)、药王庙、太白庙、八蜡庙、厉坛、先农坛、土地祠、风雨雷神坛等。清嘉庆《汉中府志》记载的较大庙宇、祠坛就有 553 处,平均每乡镇两座以上。汉中各县旧志书也有大量记载。新县志对此的记录虽较简约,但从中也可了解到汉中各县遗存寺庙的情况。如城固县清康熙年间有较大的佛道庙宇 64 处;旧时民间有“东西原公(村)十里鸾,一里一座庙”之说;解放后尚存佛寺 286 处。洋县在解放前尚有寺院庵观 430 余处。南郑旧志载境内有影响的寺庙 20 余处,但未记入的,如今红庙境内有住持、有庙产的中小型庙宇就有 30 余处,全县不少于 300 处以上,至于财神、土地、魁星等独家小庙,几乎村村皆有。《镇巴县志》记载:清嘉庆时设定远厅筑厅城,就建庙 20 余座,而乡村集镇的庙宇则不计其数,土地庙随处可见,泉旁有龙王庙,山垭有山神庙,河流交汇处有锁口庙等等。

汉中各地情况基本如此,庙宇林立,难以数计。在众多较大庙宇祠祀中,有些是各县都不能少的,如社稷坛、先农坛、风云雷雨山川坛、文庙、城隍庙、关帝庙、启圣祠、名宦祠、乡贤祠、昭忠祠等。而各县又根据本地情况,设立不同的寺院、庵观、祠堂,以祭祀不同的神仙及神化了的先人圣哲。如留坝厅早有留侯祠(祀刘邦谋士张良);定远厅有桓侯庙(祀张飞)、班公祠(祀首任同知班逢扬);南郑、褒城均设酈侯祠(祀汉相萧何);城固有唐仙观(供奉得道成仙升天的唐公昉)、原公寺(祀明代原杰)、杨将军庙(祀宋代杨从义);洋县建有蔡侯祠(祀纸圣蔡伦),沔县有武侯祠(祀诸葛亮)等。一般情况下,府、州、县城内大的坛、庙、祠等多由官府出资建设并祭;散建于名山圣水和乡村集镇者,则多为民建或官民合建,以民祭为主。而几乎是村村有庙,月月有会。

2.2 明清陕南庙会的特点

定期的庙会、年会、古会是集市贸易的另一种形式,统称为集会型集市。甚

至在社会发生变动、庙拆神倒之后，在原寺庙所在地仍保留作为定期贸易集市的庙会。清人柴桑说“交易于市者，南方谓之趁墟，北方谓之赶集，又谓之赶会，京师则谓之赶庙”^[1]。这种集市，集期间隔长，规模大，参加人数多，尤其是职业商人包括长途贸易商人卷入其中。

庙会上除了买卖专供烧香许愿、求神拜佛用的香蜡纸烛等商品外，还有广大群众日常的生产、生活所需，另有特色小吃、儿童玩具等庙会本身所具有的祀神、娱乐、贸易等多种功能中，交易应该说是最具有实际意义的。其贸易范围比集市大得多，大致可达方圆数百里，三五个县的范围或更大些。其商人来自各地，商品品种、数量和交易量都远远超过一般集市。陕南农村庙会市场是农村生产资料与日用百货的主要供应渠道，每年庙会一般与农村节令和生产季节相连，多为生产资料的专业集市。农业生产由于受自然力作用而有较强的季节性，春种、夏收、秋播、冬藏成为农业生产的规律，为适应不同季节生产需要而形成比较集中的购买行为，使庙会与农业资源配置的联系日益紧密起来。

农具交易市场，是庙会贸易的主体市场。农具产品种类很多，如犁、耢、木锨、木叉、扁担、架子车、大车及镰刀、锄头、铡刀等；日用品如盆、瓮、锅、镢、碗、碟、棒槌等，如留坝的手杖，商南的砂锅，南郑的藤椅、棕箱，另外还有许多其它产品，都深受顾客欢迎。农民的铁制农具如犁、耙、锨、锄等，木制、竹制、石制农具如簸箕、竹箩、水车、石磨等，通常在附近的集会或庙会上买到。如城固县二月初三日的“松花会”，洋县谢村七月十五日的“观音堂庙会”等是为农事准备之会。山阳县“浴佛大会，商贾云集，买卖牛马及雨笠锄帚等物，以名农会”；商县有“杨泗将军会，人民拈香买无，往来甚众，会中多买卖农具有卜”^[2]。汉阴县有“三月三”传统庙会和铁瓦殿六月二十三朝山庙会和黑龙洞的九月十八日庙会。南郑县的“牛马会”从每年农历二月半开始，南郑县的南海、红庙、黄官、青树子、新集、喜神坝、元坝等地，一个接着一个逢会；直到四月中旬，三夏农活开始才完。“牛马会”是以买卖牛、马及其它牲畜为主，以农具、农产品、日用生活品为副的交易会。会间有戏剧、杂耍及民间“社火”助兴。如新集镇的古会，除本地区各县的人之外，还有四川、湖北、甘肃等邻省的商贾和农民。影响之大，交易之广，来人之众，为全县“牛马会”之首。三月古会，

[1] 《燕京杂记》，引自《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六帖，第10页，上海普易堂印本。

[2] 宋伯鲁等《续修陕西通志稿》卷一百九十八，《岁时》，民国二十二年线装本。

来历已久，它既是农民春耕的“备耕会”、又是本地区牲畜、农具及其它生产资料的“调剂会”。它对促进农业生产，山货流通，解决农民的物资余缺，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受到群众的欢迎。

由于庙会期间看热闹、烧香许愿、参与游神的人多，就吸引了大量商人前去摆摊设点，推销商品；另一方面，来参与活动的人本身就将其视为消闲的机会，因此也就必然希望在这里进行消费，这就造就了商业贸易的功能，即所谓的“文艺搭台，贸易唱戏。”

“武侯墓清明文化庙会”，是陕南最大的古文化庙会活动，延续近两千年。由于诸葛亮被誉为中华民族智慧的化身，受到历代人们的敬仰，传说诸葛亮死后葬于勉县定军山下后，各地百姓纷纷私祭于山坡道路旁。公元263年，后主刘禅于是顺从民意，近墓立祠，为诸葛亮修建了第一座祠庙（今武侯墓庙），并在墓前植柏树五十四株，象征着诸葛亮的在生之年。同时规定在修祠之后，臣民百姓都要在祭拜武侯庙时，要以很隆重的礼仪来进行祭拜。于是扫墓、祭庙凭吊武侯的礼节便开始形成。武侯墓就成为了唯一祭祀诸葛亮的场所而世代延续，形成了如今每逢清明时节武侯墓数十万人祭祀、凭吊诸葛亮的传统文化活动。每年的此时都要在此举行规模盛大的文化旅游活动和祭祀活动，形成了有戏剧、杂耍、游园、展览、民间文艺、物资交流、购物等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文化贸易交流活动。同时，地方小吃、传统工艺品、歌舞演出等都汇集于此。

小南海是陕南另一重点佛教圣地之一，距汉中市35公里。记载始建于唐，重修于明万历四十七年，清光绪十三年，慈禧赠以“波润天地”匾额。每年正月初一至十五举办大型庙会“观音会”，全国各地前来游玩朝拜的人上万，届时各地商贩也前来设摊，出售他们的商品。商品大多是香、蜡、纸、玩具、小吃等，满足了游人的需求，也给商人自己带来颇丰的收入，活跃了商品市场。

同时，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购买力的增加，使农村商品交换内容发生了很大变化，市场交易从以奢侈品为主开始转变为以民生日用品为主，生产者之间的交换逐渐成为市场流通的主要内容。“日中为市，各相交易，所卖者不过布帛米粟……鸡豕牛驴，是其畜养，即布帛花锦，以及蔬菜等项，无非肩挑背负，图升合以糊口”、“数晨竞一墟，邸店如云屯；或携布与褚，或驱鸡与豕；纵横箕帚

材，琐细难具论。”^[1]使人们把赶庙会交换牛羊马骡，家用什物，农工器具作为主要内容，庙会作为农村初级市场的作用日益明显。

明清陕南农村经济增长，购买力增加，民风习俗由俭转奢是庙会经济繁盛的直接驱动力。人们多借庙会炫耀糜费，酬神祈福，直接驱动了陕南庙会经济的发展，使佛事庙会从单纯民俗文化活动日益转变为沟通城乡物资交流、调剂余缺的社会经济活动，成为明清陕南农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使庙会与经济接轨，把民俗文化活动与农业资源配置和商品交流联系起来，是明清陕南庙会活动最大的变化。这一变化使得明清陕南庙会经济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明清陕南庙会活动的空间分布和时间延展急剧增长，各府、州、县、村、寨均有庙会，家家酬神报赛，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发展高度。庙会举行地点大都在居民区中心或附近，给人们带来极大的便利。往往各地轮流办会，使庙会成为“村村有会，月月有会”的经常性交易行为。从空间分布讲，陕南各府县均有庙会，并且是一年数会，连绵不断。如：汉中府的二月初二的文昌帝君庙会，南郑县二月十九的小南海“观音会”，三月十八的东岳神庙会，四月初八的浴佛道场和七月初七的奎星庙会。这些州县庙会规模一般都很大。洋县全县有 69 处，其中规模较大的有，见表 1。

表 1 洋县较大庙会表

会名	会期（农历）
新铺庙会	正月初九、六月十九日
磨子桥文昌宫会	正月十一至十三日
槐树关庙会	正月十五至十八日
酆都山庙会	二月初一、七月十五日
良马寺庙会	二月初二至初五
马畅庙会	二月十五至十八日
谢村观音堂庙会	七月十五日
龙亨铺会	四月初八
智果寺赛经会	六月初六

^[1] 贺长龄：《清经世文编》卷卷五十一，中华书局 1992 年版。

城隍庙会	八月初一、初二、初三为前“八月二”会； 十一、十二、十三为后“八月二”会。
开明寺武营会	八月初六至十二日

（资料来源：洋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洋县志》，西安，三秦出版社，1996年。）

会期一般为三天，唯酆都山、谢村观音堂庙会长达半月。庙会期间，各地小商贩提前划地搭棚，摆摊设点，四方民众赶会买卖物品。

这种庙会空间上分布的密集性和时间上的连续性，使定期的庙会实际上演变为经常性的大型商品交易活动，为农村市场经济的发育提供了广阔的余地和发展空间，成为陕南商品经济发展的重要表现。

第二，明清时期陕南庙会对沟通城乡物资交流，实行农业资源的配置发挥愈来愈重要的作用。在明清以前，陕南的庙会主要是以民俗文化活动为主，无非是敲锣打鼓，社火龙灯，唱戏酬神，饮酒作乐。明清以后，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交换的频繁，使庙会活动的内容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佛事民俗的文化活动日益被商品经验、农事准备的经济活动所代替，各级庙会已成为“虽祀神也，而藉以销售农工需用之器也”的经贸活动，唱戏酬神则反而成为“招致市场”的广告宣传手段。这种变化各县庙会皆然，十分普遍。如镇安城隍庙会“阖邑奔走，外境商贩亦纷至沓来，扰扰经旬”；商县“杨泗将军会，人民拈香买物，往来甚重，会中多卖农器布疋”；^[1]每年清明节，勉县武侯祠庙会，会期3天，均有戏班演出三国戏及其它历史剧目，方圆几十里的百姓扶老携幼而来，烧香谒拜，同时举行盛大的物资交流会这些都清晰反应了庙会功能的变化。

第三，明清陕南庙会活动的组织者日益转变为以商人为主。在明代以前，庙会活动因系佛事民俗活动，均由各村自发组织，轮流操办。进入明清以后，庙会日益成为社会经济活动，商品交换、调剂余缺成为庙会活动的主要内容，逐使庙会的组织者多以商人发起并任其事，成为商家招徕客户的商务活动。商人兴建的会馆成为定期的庙会集市市场，往往会馆和庙会合二为一，会馆本身发展为交易之所。会馆作为庙宇在乡土神诞辰或其他传统节日要举行庙会祭祀的宗教活动，成为会馆的基本活动。会馆的庙会活动带有浓重的商业经营的色彩。《续修陕西通志稿》就中指出庙会活动是“每借祀神开设而实在行销土货。”^[2]“从经商角

^[1] 宋伯鲁等《续修陕西通志稿》卷一八九，西安：陕西省通志馆，1935。

^[2] 宋伯鲁等《续修陕西通志稿》卷一百九十八，《岁时》，民国二十三年线装本。

度借庙会之机，推销商品，乃商家最好之机遇，故会馆者皆庙宇也。”^[3] 陕南会馆在城镇中分布区域广、数量多。在整个陕南地区，上至府城，下至部分乡镇，均有大大小小的会馆分布其中。

详见下表 2。

陕南地区主要会馆分布统计略表

城镇名称		始建时间	会馆名称
汉中府	汉中府城	道光、同治年间	山西会馆、河南会馆、两湖会馆、江西会馆、福建会馆、四川会馆等
	西乡县	嘉庆年间	山陕会馆、四川会馆、武昌会馆
	城固、洋县	道光、同治年间	山西会馆、江西会馆、两湖会馆
兴安府	安康	道光、同治年间	武昌会馆、黄州会馆、湖南会馆、江西会馆、中州会馆、四川会馆、福建会馆、陕西会馆、同帮会馆等
	石泉县	嘉庆、道光年间	江西会馆、江南会馆、湖广会馆、武昌会馆、黄州会馆、河南会馆、四川会馆、山陕会馆等
	汉阴县	嘉庆年间	江西会馆、江南会馆、湖南会馆、湖北会馆、山陕会馆
	白河县	嘉庆、道光年间	黄州会馆、武昌会馆、陕西会馆等
	镇坪县	道光、同治年间	黄州会馆、江西会馆、四川会馆等
商州府	商州府城	乾嘉时期	瓷器帮、布帛帮、盐帮、船帮、江帮、黄帮、山西帮等地域行帮会馆
	山阳县	乾嘉时期	湖广会馆等

资料来源：1. 《汉中市文史资料》第 2 辑、第 5 辑；2. 《山阳县文史资料》第 2 辑；3. 《安康县志》（商业志）；4. 《石泉县志》；5. 《西乡县志》；6. 陈良宇：《湖广移民与陕南开发》，第 418—422 页。

对会馆而言，借举办庙会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在激烈的商业竞争中取得更大的利益，会馆往往和当地民众举办大型的庙会活动，使会馆转化为定期庙会集市。

2.3 明清陕南庙会经济的作用

— 明清陕南庙会经济的繁盛促进了陕南商品经济的发展。明清陕南庙会经济活动对推动城乡物资交流，发展农村的初级市场起了基础性的作用。城市中庙会贩卖的货物以日常生活以及奢侈品为主，而广大城镇及乡村庙会则以交易生产工具

^[3] 彭大海：《周口会馆记略》，载《周口文史资料》第三辑第 96 页。

等生产、生活必需品为主，起着初级集市的作用。如果在城镇，往往有商业街存在，居民对庙会的依赖会小些。乡村居民难得有机会进城，对附近庙会的依赖性就更大。所以说“庙会者，实农村一大交易场及娱乐场也。”庙会的商业功能在乡村小镇的作用更大。

因为农业生产具有季节性强的特点，在农忙时，人们无法从事经常性的交换活动，只有在农闲时间农民才借庙会进行集中买卖，则庙会就成为沟通城乡物资交流，组织大宗商品交易的农村基础性市场。庙会期间，商贾云集，买卖集中，购销畅旺，周边邻县来与会者常以万计。清人王时叙有诗云：“山中山外货云屯，酒肆茶寮闹市门。红日渐高人扰扰，万头攒动又昏昏。”^[1]这是一首描写清代乾隆年间商州商品经济发育初期商业贸易情况的诗歌，意思是：山中运出和山外运来的货物，像天上的云彩一样多，都屯集在商州城里。酒店、茶馆一天到晚都门庭若市，热闹非凡（用“酒肆茶寮”的繁忙景象来衬托商业贸易的繁荣兴旺），早上红日渐渐升起时，街头上就已经人声扰扰，吵吵杂杂了；太阳落下，天色尚未黑暗的时候，市场上仍然是人头攒动，交易活动十分繁忙。商人趋时偕来，棚帐互支，扰攘经旬，上市骡马以千计，羊上万头，京货、估衣、竹器、农具，牲畜巨陈，云集交易，充分表现了庙会活动对促进农业再生产顺畅发展所起的推动作用。对于一年中按时举行的庙会来说，它们已然变成定期集市的一部分。有些大庙会与集镇贸易融为一体，有些小庙会成为其补充和基础。

其次，明清陕西庙会对发展农村市场经济，扩大商品流通起了促进作用。在明清的陕西农村，庙会活动的发起多与农业生产有关，其规模又与农业收成丰欠相联系。因此，庙会实质上是农业聚会或为春耕准备，或为天旱祈雨，或为祛病求嗣，延续农业劳动力，如城固的松花会等，农家妇女多赴会烧香祈子，还愿酬神。这些与农事相关的庙会活动极易使庙会与农业生产挂钩，成为农业资源配置的集中形式，使庙会更多带有骡马大会、农具之会、粟米之会、人市之会的市场经济性质。同时陕南庙会会期多选在收获之后的农闲时间，此时新谷登场，农家荷仓丰满，借庙会伺机糜费，赛富娱神。农民为祈神祈福，常常不惜重资，如勉县天爷庙会就有“三架戏，两处花，水桶大的牛油蜡”之说，这种有支付能力的集中消费，为商品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市场。此外，商人趋时赴会，走乡串寨，又为商品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余地。这些有力地促进了明清陕南市场化

^[1] 民国《续修商县志稿·人物志》

的进程。

再次，明清陕南庙会对传递信息，交流农业生产经验，发展农村文化活动有积极作用。庙会期间，外省商贩纷至沓来，进行贸易。人们走亲串友，赴会观光，使庙会成为成本最低，时间最节省的大众消费模式。而庙会活动又多在农暇之时举办，五、八月的庙会，新谷刚刚收获，家家亮富酬神，又成为人们互通丰欠、交流农作经验的有利途径。同时，庙会期间还举行社火、唱戏、杂耍等活动，吸引了周边更多的人前来娱乐，而娱乐的人群集中又导致了集中消费，带动了庙会经济，这就是所谓“文艺搭台，经济唱戏”的经贸形式。

第二章 近代陕南庙会的发展概况

1. 鸦片战争后陕南农村经济的发展及其变化及其对庙会的影响

1.1 清末民初陕南自然经济逐步解体

陕南地区在清朝中期以后,由于汉江水路交通的发展,与汉口联系日益密切,许多工业生产因受汉口的影响,尤其是技术上的提高,所以在安康、汉中也创立了一些新式的工业,但数量很少,还是以手工业为主。直至解放前夕,“汉中其主要有:纸坊、铜锡铺、烟坊、丝坊、火柴、皮坊、白铁铺、木器店、银匠铺、铁匠铺、铎厂、棕器铺、香坊、雨伞铺、鞋帽铺、酒厂、梳篦铺、油坊、笔墨铺、磨房(用人力加工稻谷脱壳的一种行业)、磨房(即面粉房)、织布厂(抗战前尚用木机以手投梭织土布)、机械修理(始于20世纪30年代后期,主要为手工操作的小修理)。^[1]详见表3。

表3 汉中市工业统计表

种类	数目	产品类别	年产量	运销地区
雨伞铺	27	油纸 布伞	约九万余把	本地及甘肃
鞋铺	54	呢鞋 布鞋	约十三万双	本地及甘肃
织布机房	33	洋布银针布条子布毛布	约五千余板	本地及甘肃
丝织业	16	绢绸丝帕绫棉等	约两千余匹	本地及甘肃
织袜铺	20	棉线袜 丝袜	约八千余打	本地及甘肃
毛笔铺	8	大小楷笔	约八万余枝	本地及甘肃
火柴公司	1	火柴 洋蜡		本地及甘肃
宁羌制革厂	1	皮鞋 皮革 皮箱等		本地区
燃料厂	1	洋靛 土靛		本地区

汉中火柴厂只能制造硫磺火柴,在陕南可首屈一指。染织厂织布所用的纱由汉口供应,染布多用洋靛,全城染坊数十家。除此而外,还有烧造精致碗盆缸的张家窑厂,制造各种罐头火腿香酒的汉发源厂,能生产发油雪花膏美容霜牙粉丝光洋袜的益秦公司等。

^[1] 余晴初:《解放前汉中市工商业概况》(下),政协汉中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汉中文史》1995年第107—111页。

表 4 安康县工业统计表

类别	品名	制造家数	工人数目	年产量	销售地
丝织业	纺绸	9	80	500 匹	陕南地区部分 邻近地区陕南 地区
	花丝葛	9	80	400 匹	
	板绫	17	100	2000 匹	
棉织业	毛巾	7	28	1200 打	陕南地区
	洋袜	8	18	1000 打	
	老布	20	20	1500 匹	
纸类	棉纸	10	30	1 000 000 刀	陕南地区
		6	20	200 000 刀	
金属制品	银器	5	10	150 件	本地
	铜器	5	10	500 件	
	铁器	3	6	1 000 件	
	锡器	4	8	800 件	
杂类	熟漆	13	35	2000 斤	本地及邻近
	肥皂	2	10	10 000 打	本地
	雨伞	8	26	20 000 把	本地

(资料来源:表 2、表 3 据《陕西实业考察》第 357~360 页的调查表删节得来。)

除这两个城市具有少量新式工业之外,在本地区还有略阳毛毡厂,其他地方有利用水力造纸、磨面、榨桐油等手工业。以上材料虽是民国时期的统计数字,也多少能反映清末的一些情况。

清末民初,由于汉江与汉口通商,商品经济有了大的发展,许多商人从汉口引进了生产技术,所以在汉中安康等县创立了不少的新式工业,使该地区有了许多新的工业品出现在市场上,也大大丰富了该地区人民的生活内容。

抗战期间,陕南虽作为大后方之一,但兴建和内迁的现代企业极为有限。在 20 世纪 30 年代中后期,陕西新增的现代工业中,设办于陕南的仅有两家,即由国民政府军政部与陕西合办设于汉中的军用颜料制造厂(资本 6 万元)和由山西

迁入城固的西北制造厂两家现代工厂。^[1]1942年12月,由三原迁汉中的“三泰”面粉厂,是汉中首家使用机器生产的面粉厂。^[2]在近代陕南重镇中,现代动力企业仅有1939年年底建成的西京电厂汉中分厂(位于汉中建国门外何家井)。此外,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又于1946年5月建成了位于褒惠渠武家沟段的水力发电厂。^[3]这两家电力工厂是近代陕南仅有的现代化发电企业。

1.2 近代陕南庙会中洋货的逐渐增加

清末陕南的商业贸易也比较发达,首先是该地区四川、甘肃、河南等省的货物交换非常繁忙,更有大宗的贸易,是依赖汉江和丹江水运与汉口的直接贸易,又可以说汉口市场是陕南货运的转运站,许多货物都是通过此地转销东南各省乃至香港、南洋及欧美各地,而同时这些地方的洋货也由此进入陕南市场,进入到庙会的商品之中。笔者根据《陕西境内汉江流域贸易稽核比较册》,以联系汉江经济区的陕境内最后贸易港口——白河港光绪二十九年(1903)至三十二年(1906)入境货物为基准,制成表5,介绍汉江经济区的商品贸易规模与汉江水运规模。

表5. 光绪二十九年(1903)至三十二年(1906)白河港入境货物

名称	产地	销路	1903年10月-1904年9月 运量(原单位/ 折合吨)	1904年10月-1905年9月 月运量(原 单位/折合 吨)	1905年10月-1906年9月 月运量(原 单位/折合 吨)
青红瓷器	江西 景德镇	兴安、汉中 各属	29676 子 /274.9	19370 子 /192.5	24770 子 /235.7
粗瓷	湖南、 江西	兴安、汉中 各属	51225 筒 /128.1	51515 筒 /128.8	77/93 筒 /194.5
条钢、 饼铁	湖南攸 县	安康、旬阳、 白河、郧西	1946 块/60.8 -	1453 块 /50.0	4560 块 /118.3

[1] 王致中:《抗日战争时期的西北城市工业》,兰州学刊1989年第3期。

[2] 蒋志德:《抗战时期“三泰”迁汉记》,载《抗战时期的汉中》,汉中市政协文史委员会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03—104页。

[3] 宋元湘:《抗战时期的汉中发电厂》,载《抗战时期的汉中》,汉中市政协文史委员会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94—96页。

苏木	南洋吕宋	汉中兴安 转运西安	1739 捆/117.4	2050 捆 /138.4	3196 捆 /215.7
蓝靛	湖北安陆	白河、旬阳	320 篓/32.0	505 篓/50.5	835 篓/83.5
颜料	东、西洋	汉中、兴安 转运西安	4003 斤 /2.0	2572 斤 /1.3	3637 斤 /1.8
洋油	美孚公司	兴安、汉中 各属	3773 箱/94.3	5894 箱 / 147	4391 箱 /109.8
洋火	汉口	陕南、川北、 甘肃	1069 箱/189.6	1447 箱 /170.0	1378 箱 /161.9
烟叶	湖北均州、河南邓县	兴安、商州、 西安	8029 捆/361.3	8178 捆 /368.0	6300 捆 /283.5
明矾	浙江温州	兴安、汉中各 属转销商州 西安	813 篓 /61.0	589 篓 /44.2	1713 篓 /128.5
石膏	湖北应城	兴安、汉中各 属转销商州 西安	1764 担 /88.2	2552 担 /112.6	3015 担 /150.8
盐	转自老河口	兴安、鄂西	480 吨	480 吨	480 吨

兴安、汉中与东南沿海相比，经济并不是很发达，因此本地的商品消费量并不是很大。但由于优越的地理环境，使两地成为连接四川、关中、湖北、甘肃的中转站，便利的汉江航道，又使两地成为连接汉江远及东南沿海经济区的中心区。我们从表 4 可见南洋的苏木，东、西洋的颜料，汉口的洋火，浙江的明矾，湖北的石膏，湖北、河南的烟叶等商品俱由两地转运商州、西安和川北。尤其是汉中成为陕南的经济中心和转口中心。“光绪十七年每年在汉江航道的船有 23000 多条，货运 100 多吨，乘客 165000 多人”^[1]。贸易的种类增多，也使庙会的商品

^[1] 汉中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天汉回眸》1998 年。

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方面是传统的自然经济贸易方式，另一方面，庙会的商品交易也受到的“洋货”的冲击。

鸦片战争之后，安康地区木耳、茶叶、丝绸、桐油、药材等传统的农业土特产品转出口量逐步增加，与东南各省及海外的商贸往来联系不断加深，“洋火”、“洋布”等西方日用工业品开始进入安康市场，在买方市场的拉动下，茶叶、桐油、丝绸、生漆及名贵中药材的生产发展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但由于帝国主义势力疯狂掠夺，封建统治阶级残酷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劳动人民承受繁重的赋税和外国赔款的双重负担，饥寒交迫的生活状况并无改变。民国时期，社会动荡，捐比税多，各种摊派繁重，特别是抗日战争中武汉沦陷后，汉江航运受阻，割断了安康地区与东南各省主要的商贸通道，传统的农副土特产品失去了主要的销售市场，生产一落千丈。

洋货在陕南集市及庙会上皆有销售。通常都是老百姓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东西。如牙粉、牙刷、洋钉、肥皂、洋火、洋靛(蓝的)、染布用的颜料(洋红、乌粉、灰粉、品洋)、各种瓷器、洋瓷水角(把碗)、胶底鞋、毛面巾、洋袜子、围巾、洋油等。很多是近代以前市场上没有的，近代以前的老百姓完全可以不用，无须购买的，或替代了近代以前市场上的传统手工业品，它们替代了近代以前老百姓完全能够自己生产的用品。近代以前老百姓完全能够自己生产的用品，也无须从市场购买，但是，到清末民国时期，随着社会和市场的变迁，老百姓基本上要从市场上购买这些商品了。

但是，由于陕南人们长期形成的传统的消费习惯和消费心理，使近代工业品在深入农村市场时，遇到很大困难。农民愿意接受洋货和他们有支付能力的产品是十分有限的，而这种习惯的转变和能力的提高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农本商末”历来是人们根深蒂固的老观念。一般人认为，只要搞好农业，就不愁吃的；经商却要冒很大的风险。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汉口成为通商口岸，价廉物美的洋货和近代工业产品大量涌入，沿着汉江航道进进出出的人流也把山外流行的观念和时尚带进山区。在这种情况下，陕南老百姓的消费观念开始发生了悄悄的变化。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商品因素的渗入、社会生活方式的变化，市场在人们的经济生活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的情况下，人们的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使庙会的价值定向和存在方式都发生了适应性的变化。农民们不再满足于“力农防饥”，而是以经商为

业，并满足各方面的需要。人们商业意识的增强，使社会上出现了“崇商”、“谋利”的风气，人们或者通过从事贩卖谋利，或者通过种植经济作物、养殖禽畜谋利，养猪是主要的农家副业。在这种“谋利”风气的影响下，各地种植经济作物、养殖禽畜的积极性很高。“一户中喂猪十余口，猪至市集，盈千累万，船运至汉口、襄阳，亦山中大贸易”^[1]。同时安康沿汉江两岸有不少人家捞鱼，去城镇集会上出售，例如在安康巴公岩就有许多人大鱼，而且流传江歌一首如下：“钓下小鱼去换酒，钓下大鱼去换钱：只要一线一竹竿，胜似农家十亩田”^[2]。

而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许多农民部分摆脱农业生产劳动而专门从事商业活动，大大改变了他们的经济生活状况。在较大的城市里，人们从事商业活动的积极性更高。

2. 近代陕南庙会的特点

其一，近代陕南庙会还保持着明清时期的态势，继续缓慢发展。

每逢集会日，庙会周围地区农民积极“赶会”，会上不但有农具、耕牛等生产资料，而且各种京广杂货、洋货等日用品也一应俱全，能充分满足广大城乡人民的生产生活需要。不少会市，异常热闹，规模较大，省内外商贾云集。以商南县为例，在商南县境内沿袭的庙会有 13 个。农村以龙头会、娘娘会、黑龙会、黄龙会、祖师会规模最大，持续长达 3-7 天。如表 5

表 5 商南县主要庙会表

地名	庙会名称	日期（农历）	上会人数	成交额（元）
城关镇	四月八日会	四月初八日	100000	750000
富水街	龙王会	二月初二日	3500	1400
富水街	四月二日会	四月初二日	5000	16000
富水街	仙如会	腊月初二日	7000	23000
龙窝	祖师会	四月十五日	1500	4000
新庙	娘娘会	二月十九日	1000	2800
试马街	老君会	四月十二日	6500	21500
红庙街	祖师会	十月十日	800	4100

[1] 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卷九，清道光二年刻本。

[2] 民国《安康乡土志》卷十《汉江利益》。

西磨沟	金佛寺会	十月十五日	700	3800
八龙庙	娘娘会	九月十九日	500	2300
清油河街	农具交流会	四月十五日	5000	28000
铜场街	三官庙会	十月十九日	6000	35000
赵川街	娘娘会	九月二十九日	1500	3800

（资料来源：商南县志编辑委员会：《商南县志》，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281 页）

从表 5 可以看出陕南农村庙会一般消费额数就在 1000~4000 元左右，县城庙会在 15000~35000 元之间，县城的城关镇庙会交易额高达 75 万元以上。这意味着农村和城镇庙会的消费额数差别比较大，商品成交额不平衡性也较大。此外，可以看出，农村庙会要求的最低人口门槛不高，如八龙庙就只有 500 人左右，平均也就是 2000 人左右，但比一般的集市贸易到场人数要高；而城镇庙会如城关镇庙会人数达到 10 万人之这个人数就相当可观，反映出陕南庙会因地点不同而繁荣程度也不相同。又如城固县民国时期承袭的古庙会主要有 14 处，见表 6

表 6 城固县民国时期全县主要古庙会表

地名	时间（农历）	会名	地名	时间（农历）	会名
西原公	二月初三	松花会	上元观	正月二十三日	游湖会
龙头寺	三月初三	娘娘会	五郎关	三月初二	五郎会
安乐堂	正月廿三日	扫把会	孙家坪	二月初二	不详
文川	二月初二	黄春院会	县城	三月二十八日	东岳庆尝会
朝天观	三月初三	娘娘会	县城	四月十八日	城隍庙会
独丘山	三月二十日	平水明王会	县城	五月十三日	关帝会
柳林铺	四月廿八日	辅德城隍会	县城	六月初六日	平水明王会

（资料来源：城固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城固县志》，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 年。）

近代的陕南庙会依然承袭传统的游乐性，和平时集市相比，饮食市场特别发达。

庙会期间，临时建成的饭馆、酒馆、茶馆林立。它们一般在布棚、席棚中营业，也有设在露天的。主要经销大众食品，如热面皮、粉皮、小笼蒸包等。此外，在会上的还有许多小贩挑着担子在人群中穿行。哪里有生意，就在哪里营业。此类小贩，常见而有特色的，有以下十多种：

卖凉粉的。遇到顾客时，放下担子。把凉粉切成小块，再一抓，盛进碗里，加入醋、盐、芥末糊、蒜汁、油泼辣子等调料。号称“担子(生意)虽小，调料齐全”。顾客以妇女居多。

卖凉面皮的。担儿里挑着面皮、豆芽、精盐、醋、辣椒油。每种调料分别盛在一个细瓷小碗里。挑到目的地后，将部分面皮切成条状，整整齐齐地堆放在木盘里，再用湿抹布盖住——怕干了。遇到顾客，便揭开抹布，将面皮条、面筋块抓在碗里。每只碗约抓面皮3两，豆芽1两。

卖馄饨的。挑着炉子、面、调料、水、燃料等。卖时，取馄饨皮一摞，逐个包入馅子(约7分重)，裹成馄饨，下进开水锅中(每碗约下12个)。在碗中先舀入鸡汤，加酱油、精盐、味精少许。锅开后，将馄饨捞入碗中，上撒虾皮、紫菜、韭黄节、胡椒粉各少许，淋上芝麻油即成。

卖蜂蜜凉粽子的。肩挑一担，随处叫卖。遇有顾客，将粽子剥去包皮，用丝线勒成3分厚的薄片，放在碟内，蘸上蜂蜜与黄桂酱，递给顾客。

卖醪糟的。担子上挑有炉子、小风箱、铜瓢和醪糟、水、鸡蛋等。鸡蛋可打为絮状，也可打成荷包型。

卖油茶的。将油茶盛在大铜壶(或大铁壶)中，背着走。壶外面有棉布套，用来保温。卖时，把壶放下，将壶身斜着一摇，以便把油茶中的配料如杏仁、花生、芝麻也倒出来。

卖豆腐脑的。豆腐脑盛在瓦瓮里。瓮底小，口小腹大，底部套有木架。卖时，用特制的平勺将豆腐脑舀入小黑碗里，加上调料，递给顾客。

卖冰糖葫芦的。扛着木柄草靶，冰糖葫芦插在草靶上。木柄一端安有铁尖。遇到合适地点，将草靶竖插在地上，再大声吆喝。

吹糖人的。是一种民间艺人。用竹管蘸上糖汁，一边吹，一边捏。其作品有十二生肖、戏剧人物等。有些艺人的作品，形象逼真。上色后，五彩斑斓，可玩，可吃。

此外最吸引人的就是玩具市场了。庙会上的玩具市场最为花哨。在民间儿童玩具摊上，摆满了假面、戏剧木人、小车、刀矛、竹龙、竹哨之类小玩节。卖玩具的方法有多种，例如：套圈。摊主在地面摆一些玩具，值钱的在远处，价廉的在近处。顾客从摊主手中买下竹套圈，在规定地点把圈掷出，套中何物，何物就归自己。摇彩。置一带指针的木盘，盘内放玩具若干。顾客花点钱，用按钮发动

指针。指针停止运行后，指着什么玩具，该玩具就归顾客。据说，摊主在木盘空档处和廉价的玩具下面安装有磁铁，借以吸引指针。打枪。置一立柜，柜上有若干小门，门内分别装有玩具，门口都设有靶。顾客向摊主购买软木子弹，用枪击靶。如击中，小门自动开启，里面的玩具便归顾客。

近代陕南庙会是与文化娱乐有关的节日活动，有各类民间艺人进行表演营生。其中主要有：

汉中的汉调桡桡戏（也称“南府秦腔”）。汉中地区人民较少有听西府秦腔的。大多数寺庙建筑中，多有“戏楼”，也叫“戏台”。戏台前面是广场。这种设施，构成了庙会开展文艺活动的基本条件。庙会期间，由主办单位雇戏班子在此演出表现福、禄、寿、善、喜主题的剧目。

近代最有特色的要算拉洋片了。又叫“看西洋景”、“西洋镜”。在装有凸透镜的木箱中挂着各种画片。艺人一面拉换画片，一面说唱画片的内容。观众从透镜里可以看到放大的画片。过去交通不发达，老百姓很少外出，有些人就连县城也很少进。农民们通过西洋镜，可以看到上海大世界、苏杭风光、北京故宫和国外名胜，从而开拓了眼界。抗日战争时期，艺人们常用连环画宣传抗日。

扁担戏。即木偶戏。艺人们出行时，用扁担挑着全部道具，故名。表演时，艺人把自己围在帐幕里，木偶露出帐幕顶端。表演结束后，艺人走出帐幕，向观众要钱。

另外，还有表演武术的，耍杂技的，演马戏的，变魔术的，说书的，等等。有的设有帐幕，艺人在里面表演，观众掏钱入内观看。

其二，近代以来，陕南庙会的世俗性进一步增强，陕南许多庙会受到社会变动和“洋教”渗透的影响。陕南许多庙会期间，各色人等，香客、商人、农民、戏班、赌徒、妓女等纷至沓来，其中，商人是庙会人员构成的重要组成部分。庙会期间，常有巫婆、神汉装神弄鬼，妖言惑众，诈骗财物。寺庙里，一些人大搞算命、抽签、求仙方、发圣水等迷信活动，欺骗乡愚。此外，随着西方“洋教”的侵入，陕南的一些农民在当时的现实条件下开始信仰基督教、加入基督教，因为他们无力挽救自己的命运，只能试着依靠“洋教”。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秩序的动荡不宁及自然经济的逐步衰落，可以说是外来“洋教”扎根生长的最好温床，旧有的社会思想体系似乎已无法解释现实社会的变化，人们需要新的思想体系以面对现实，需要在精神上得到合理的解答作为心灵的慰藉。而现实中，最需要这种

慰藉的往往是那些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人们。《镇巴县志》曾记载“民国四年(1915),汉中教区西乡天主教会意大利籍传教士诺神甫来镇巴传教时就宣传‘劝善救世,脱灾升天堂,入教蒙惠,不遭祸殃’”^[1],这种宣传十分迎合群众的心理。同时对大多数农村人来说,除了几个节日(通常一年只有两到三个),伴有戏剧演出的大集市庙会或是没有集市的戏剧演出之外,没有什么大众消遣方式。信仰基督教,定期参加宗教聚会、集体唱赞美诗于是成为农民心目中的一种娱乐和消遣方式,加强了农民互相之间的沟通与联系,并且给他们平时单调的生活带来了乐趣。因此人们对庙会的渴望与追求受到了一定的影响。

其三,近代陕南庙会的商品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商品的种类增多,洋货进入庙会交易中。近代以前,庙会上交易的主要是一些传统手工业品,如犁、耢、木铎、木叉、扁担、架子车、大车及镰刀、锄头、铡刀等;日用品如盆、瓮、锅、镢、碗、碟、棒槌等简单的手工制品。而到了近代,尤其是清末民初,洋货在陕南集市及庙会上皆有销售。通常都是老百姓的日常生活用品。如牙粉、牙刷、洋钉、肥皂、洋火、洋靛(蓝的)、染布用的颜料(洋红、乌粉、灰粉、品洋)、各种瓷器、洋瓷水角(把碗)、胶底鞋、毛面巾、洋袜子、围巾、洋油等。“洋货”渐渐代替了土货,对于传统的手工业带来的冲击很大。

其四,近代陕南的庙会经济由于受到交通变化的影响存在着不稳定性。

由于陕南地区特殊的地理环境,有秦巴大山的阻隔,地形复杂,公路修建十分困难。“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就是对这里地形复杂难行的描述。近代陕南的现代公路建设比较晚,而且公路的数量很少,等级质量也较差,水路运输与传统古道并用仍然是区域内外运输中的主要方式,陕南交通落后的局面一直到近代都没有能得到根本改变。直到民国时期,陕南地区区域间的陆路运输仍主要依靠畜力和人力的局面并没有太大改变。汉江是联系陕南与中西部贸易的主要运输通道,汉江上溯汉中,下至老河口、汉口,是20世纪50年代以前的主要交通运输线,在发展山区商品经济,繁荣市场,进行文化交流方面起过重要的作用。至民国14年(1925年)以前及民国26年(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后,是汉江航运的鼎盛时期。当时往返于汉江上的木帆船,经常保持在两千余艘。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武汉在抗日战争中失陷,水运阻隔,汉水航运衰落,大量出口特产无法外运,初绕道河南信阳销售,后改道运往汉中,西安或经紫阳入川,因战事发展,市场萧条,传统出

^[1] 镇巴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镇巴县志》,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

口商品每况愈下,基本停止。汉江水运的便捷,曾为陕南商品经济的繁荣,商业的发达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但也应该看到这种发展是极为曲折和短暂的。到1935年以后,随着陇海铁路延展到西安和宝鸡,铁路是更加快捷、便利和低廉的交通工具,并不受高山河流的阻隔,从而改变了陕南长期依托水运货物的格局,汉江和丹江水运的便利条件也逐渐失去。

1935—1936年国民政府主持修建了汉宁公路(起自褒城,经勉县、宁强与四川交界的棋盘关,接成(都)广(元)公路,全长141公里)。汉宁公路筑成后,沟通了陕西和四川的通道。1938年12月,汉白公路又建成通车,使陕南地区有了东向的现代通道。此外,国民政府在这一时期还主持修筑了西荆公路,这是陕南商洛山区连接关中、沟通豫鄂的唯一现代公路。这些现代公路的建成,为陕南的开发创造了条件。但是,这些公路的修建已经到了近代晚期,而且当时汽车数量又极为有限,当时公路运输又主要是为军事服务(如汉白路通车后,民用物资每周仅由汉中对开一次)^[1],“民用货物主要还是靠马车运输或骡马驮运,甚至是用原始的人背、肩挑”^[2]。随着汉江和丹江水运的衰落,陕南地区的经济也逐渐衰落下去,到解放前,陕南的经济并没有大的发展。陕南的庙会经济很大程度上也受到影响,在民国时期缓慢发展,并无大的突破。

3. 陕南庙会上活跃的各类“商人”

近代陕南庙会上活跃着的各类“商人”,也包括亦商亦农的“准商贩”。庙会上“商贾云集”,除了坐商大贾,主要还有小商贩、独立手工业者和农民。庙会一般在农闲时举办,这时的农民经济情况也较宽裕,往往会利用逛庙会之际购买或换回必要的生活用品,庙会期间,商贩云集,商品充盈,除提供一般日用品之外,还能够补充小集市商品种类和档次的不足,满足农民婚嫁、年节之需以及富贵人家之较高层次的消费需求。平时买不到的,卖不掉的东西,一般都能买到、卖掉,庙会上商贩们生意兴隆,几乎都是忙得不可开交,营业额为平时的好几倍或几十倍。当然,小商贩和独立手工业者毕竟是小本生意,收入很有限。但无论如何,在短短几天,收入是平时的好几倍,总还算是利润可观的。在“临时商人”中也有农民,这时的农民是作为商人的身份出现的。他们借庙会之机,出售农副产品,购入生产和生活用品。庙会期间,四乡农民,成群结伴去赶会。他们一方

^[1] 安康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安康市志》,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341页。

^[2] 杨超:《陕西省汉中地区地理志》,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03页。

面准备去庙里替亲友祈福，另一方面，顺便捎带自己编制的竹器、芦帚以及各种农产品，去庙中烧香后，便出售自己带来的产品，选购急需的用品。

近代以来的陕南农村，随着自然经济的逐渐解体，农产品日趋商品化。一方面，他们为了获得货币，不得不把剩余农产品卖出，还要尽可能地发展家庭副业生产，如养殖，制作手工业品拿去市场出售，从而增加收入。由于小农经济时代，国内统一市场发育不完全，在陕南农村，农民出售农副产品主要依赖当地和附近的集市与庙会。

第三章 余论

明清时期, 陕南庙会的取得了很大发展。近代以后, 陕南庙会继续缓慢发展, 但实质变化不大, 庙会经济并没有得到有力的开发, 对陕南地区经济的带动作用也没有有效的发挥出来。如今, 在西部大开发的大好时机下, 对于陕南地区的旅游资源开发更是一次历史机遇。

一是优化经济产业结构, 发挥陕南的地域优势, 大力推进庙会经济对陕南经济的带动作用。陕南有非常多的优势, 如植被覆盖率非常高、水资源极其丰富且水质优良等, 但正是这些优势的“制约”, 为了保护这些自然生态资源, 客观上使很多产业和项目无法在陕南布局。靠山吃山, 靠水吃水。陕南的发展不能依赖规模化的现代工业和传统的农副业, 只能充分发挥自然生态和文化历史等特色资源的优势。找准旅游定位, 以旅游业为龙头, 带动与旅游业相关的工业、第三产业、绿色生态农业的协调发展。因此, 要充分利用庙会这一特殊的传统文化形式, 抓住机遇, 取得发展。

二是发展交通运输, 促进商品流通, 使庙会的商品功能更好地发挥。“交通运输业在山区经济建设中具有特殊的先行战略地位。对于广大山区而言, 大力发展交通是多层次开发山区资源, 尽快摆脱山区贫穷落后面貌的需要, 也是缩小西部与东部、山区与平原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的迫切需要”^①。明清时期, 汉江航道的繁盛促进了陕南地区经济的发展。清末以后, 航道阻塞, 秦巴山区交通状况十分落后, 严重制约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陇海铁路修到宝鸡, 汉江水运衰落下去, 陕南地区经济更加恶化。直到改革开放以后, 陕南地区才逐步形成了以县城为中心的公路运输网。近年来, 陕南地区的交通条件有了较大改善。其一, 西安至汉中的铁路贯通; 其二, 西安至安康的铁路经柞水、镇安, 与襄渝铁路衔接; 其三, 西安至南京的铁路在蓝田与西安至安康的铁路联接, 翻秦岭经商州、丹凤、商南县并贯穿豫西南与京广铁路衔接; 其四, 西汉高速公路于 2007 年 10 月开通, 使汉中至西安仅需三个半小时, 成为连接中国西南和西北最活跃的成渝和西安两大经济圈的枢纽, 这无疑激发了汉中发展的巨大潜力。交通道路的改善将为经济发展带来新机遇。在此条件下, 还应大力改善县乡公路交通, 为陕南城乡人民的生活水平的提高铺平道路。

^① 陈者香:《中国山区经济学》, 红旗出版社 2001 年版, 第 9 页。

庙会对促进陕南地区经济的发展和繁荣，产生过积极的作用。庙会是一个特殊的市场，在流通领域发挥其优势，庙会上商品集中经营和管理，使祭祀能够顺利进行。庙会市场上汇聚了各类商品，而突出祭祀类商品，如香、烛、炮、裱、泥塑等民间工艺品，以及一些儿童玩具，成为经济成份的有益补充。尤其在今天，随着媒介的发展和利用，新技术市场，信息市场，劳务市场的开拓，变原来以祭祀为主要内容的古庙会为开放性的市场。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党中央提倡发扬优秀的传统文化，想方设法丰富人民群众的文化娱乐生活，发展经济也需要挖掘旅游资源。于是，陕南地区已经或正在恢复举办庙会。只要认真加以引导和组织，庙会这一具有悠久历史的民间传统文化形式，不仅可以活跃人们的生活，而且可以给当地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

主要参考文献

一、 方志、文史资料

1. 卢坤：《秦疆治略》，台北成文出版社 1970 年影印版。
2. 仇继恒：《陕境汉江流域贸易稽核比较册》，宋联奎辑《关中丛书》，民国 24 年排印本。
3. 宋伯鲁：《续修陕西通志稿》，民国二十三年陕西通志馆线装本。
4. 郭琦、史念海、张岂之：《陕西通史》民国卷，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
5. 钱鹤年：《汉阴厅志》，清道光二十三年刻本。
6. 史左：《西乡县志》，清康熙二十二年刻本。
7. 李国麟：《兴安府志》，清道光二十八年刻本。
8. 吴世泽：《紫阳县志》，清光绪八年刻本。
9. 舒钧：《石泉县志》，清道光二十九年刻本。
10. 严如煜：《续修汉南府志》，清嘉庆十九年刻本。
11. 王森文：《安康县志》，清嘉庆二十年刻本。
12. 刘德全：《洵阳县志》，清光绪二十八年刻本。
13. 郭凤洲：《续修南郑县志》，民国十一年刻本。
14. 杨孝宽：《平利县志》，清光绪二十二年刻本。
15. 罗传铭、路炳之：《商南县志》，民国八年铅印本。
16. 藤仲黄纂修：《镇安县志》，民国十五年石印本。
17. 严一青：《白河县志》，清嘉庆六年刻本。
18. 余修凤：《定远厅志》，清光绪五年刻本。
19. 张鹏翼：《洋县志》，清光绪二十四年手钞本。
20. 孙铭钟：《沔县志》，清光绪九年刊本。
21. 马毓花：《宁羌州志》，清光绪四十年刻本。
22. 郑谦修：《安康县志》，清咸丰三年重印本。
23. 何镜清修：《续修商县志稿》，民国三十年刊本。
24. 陈艺芬：《宁羌乡土志》，民国二十六年铅印本。
25. 《城固乡土志》民国二十六年铅印本。

26. 留坝县志编纂委员会：《留坝县志》，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
27. 紫阳县志编纂委员会：《紫阳县志》，三秦出版社 1989 年版。
28. 陕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陕西省志·工商联志》，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
29. 陕西省航运志编纂委员会：《陕西省志·航运志》，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
30. 陕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陕西省志·商业志》，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
31.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选辑》，三联书店 1987 年版。

二、 专著

1. 高有鹏：《庙会与中国文化》，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
2. 高占祥：《论庙会文化》，文化艺术出版社 1992 年版。
3. 张双林：《中国庙会大观》，工商出版社 1995 年版。
4. 赵世瑜：《狂欢与日常——明清以来的庙会与民间社会》，三联书店 2002 年版。
5. 田培栋：《明清时代陕西社会经济史》，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
6. 田培栋：《陕西社会经济史》，三秦出版社，2007 年版。
7. 李刚：《明清时期陕西商品经济与市场网络》，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
8. 王兆祥，刘文智：《中国古代的庙会》，商务印书馆 1997 年版。
9. （美）施坚雅：《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8 年版。
10. 傅衣凌：《明清农村社会经济》，三联书店 1961 年版。
11. 葛剑雄：《中国移民史》，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
12. 龙登高：《中国传统市场发展史》，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
13. 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年版。
14. 王笛：《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44-1911）》，中华书局 1998 年版。
15. 孙健：《中国经济通史》近代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
16. 王开：《陕西古代道路交通史》，人民交通出版社 1989 年版。

三、 论文

1. 李刚、郑中伟：《明清陕西庙会经济初探》，载《西北大学学报》2001 年第 2

期。

2. 张萍:《明清陕西庙会市场研究》,载《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3期。
3. 小田:《近代江南庙会与农家经济生活》,载《中国农史》2002年第2期。
4. 徐礼山:《清代汉江上游的商品流通与市场体系》,西北大学2004年硕士论文。
5. 许檀:《明清时期农村集市发展》,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2期。
6. 朱越利:《何谓庙会》,载刘锡诚主编:《妙峰山·世纪之交的中国民俗流变》,中国城市出版社1996年2月。
7. 小田:《“庙会”界说》,载《史学月刊》2000年第3期。
8. 吉发涵:《庙会的由来及其发展演变》,载《民俗研究》1994年第1期。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学术成果

- [1] 彭宁：《从吸收外来文化看中日近代化》，《吉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增刊，2007 年 12 月版。
- [2] 彭宁：《论“三三制”民主政权对抗战胜利的意义及其作用》，《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2008 年 9 月版。
- [3] 彭宁：《陕西商帮十讲》，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8 年 4 月版，参与编写。

致谢

本论文从选题、写作到完成，都是在导师李刚教授的悉心指导下进行的，李老师治学严谨、品格高尚、工作认真负责，这些都深刻影响着我。能够成为他的弟子，我倍感荣幸。

回首三年，我做得还是很不够的，深感有愧老师对我的谆谆教导，今后只有努力工作，以不辜负导师对我的期望。

本论文的完成还得益于陈国庆教授、杨洪教授、王建军教授、梁星亮教授、张晖副教授等老师的指导和帮助，他们的学识和人品令人钦佩。论文写作期间，陕西省图书馆地方文献资料中心、校图书馆和社科系资料室等都给我提供了很大的方便和帮助，在此一并表示由衷的感谢！

论文的写作完成，历时一年有余，由于时间仓促，加之本人学识浅薄，文中难免存在纰漏和不当之处，敬请诸位师长前辈不吝指正，在此一并谢过。